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张登德
编

陈 炽 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张登德
编

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陈炽卷/张登德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300-20744-5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陈炽 (1855 ~ 1900) -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24048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陈炽卷

张登德 编

Chen Chi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28.75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52 000

定 价 6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 1840 年至 1949 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疵，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陈炽是中国近代史上有才华、有见识，起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光绪举人，官至户部郎中、军机处章京等职。所著《庸书》百篇倡议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废除厘金、实行议院等主张，颇具时代性，后此书经翁同龢推荐，为光绪皇帝御览。甲午战争以后陈炽积极参加维新运动，曾与康有为等人组织强学会，并担任会长。他认为国家之强皆原于富，撰成《续富国策》六十篇，同时协助《时务报》的筹建组稿工作，并在该报及《知新报》撰文纵论世界形势。戊戌政变后深受打击，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病逝于京都。陈炽一生写有大量论著，本卷尽可能完整地收录陈炽的条陈奏片、函电书信、序跋、诗词联赋、专著译著等，为研究陈炽思想和中国近代历史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陈炽，原名家瑶、喜炽，后改名炽，字克昌，号次亮，又号用絮，称裒中居士、瑶林馆主、通正斋生。咸丰五年（1855年）四月初七日出生于江西瑞金县瑞林乡禾塘村。陈炽的祖父、父亲皆获科举功名。陈炽幼年接受严格而系统的封建教育，6岁时开始到私塾受业，他才思敏捷，聪颖超群，经常与弟弟不管寒暑，勤奋苦读，以聪敏享誉乡里。“少小富文史，六艺资藻绩。弱冠读阴符，议论绝时辈。”^①同治六年（1867年），13岁时赴宁都州参加院试，得中秀才，引起轰动。同治十二年（1873年），陈炽以生员身份，由江西学政许庚身择优保送入京参

^① 陈炽：《绍古辞》，见《裒春林屋诗》，光绪辛巳年刻本。

加全省科考拔贡，以优异成绩，取为拔贡生。第二年，他赶往京城参加朝考，录为一等第四名，授七品京官，签分户部山东清吏司见习。同年，陈炽在京师结交江西新建人陶福祖，时陶福祖正在礼部参加考试，两人多次进行文酒之会。

光绪元年（1875年）陈炽告假回乡。江西萍乡人文韞山欣羡陈炽的才识，即让其题写条屏。陈炽不好推辞，即为其题写了吴匏庵的《赤壁诗》。不久，江西丰城诗人欧阳元斋得知瑞金出了个年轻的京官，便前来拜访，两人遂“叙情谈诗”，结为知音。陈炽的家乡人也很自豪，遂让其为家族族谱、乡贤写序作跋。光绪四年（1878年）春，陈炽为同邑里坑陈氏族人重修其族谱作序；光绪七年（1881年）又为瑞金先贤罗有高的遗著《尊闻居士集》写跋。

在家休假期间，陈炽对于家乡的教育事业也很关心。光绪七年（1881年）夏，他与邑人钟小溪、杨云樵等人筹款倡设宾兴会，以济助本地应考之生员。同年，陈炽因事赴省城南昌，巧遇江西人陶福祝、勒深之。陶、勒二人均负诗名，遂与陈炽相约举行诗会，相互切磋技艺。他们互相唱和之诗，加之欧阳熙的《荣雅堂诗》，汇集为《四子诗录》出版。陈炽所作《衰春林屋诗》，或为酬答朋友之作、或为借物咏人感叹时光流逝之作、或为表达怀才不遇之作、或为时事而作等。其中，《出虎门洋有感》《感事》等诗，展露出爱国忧民的思想，从中人们已能体察到作者的忧国忧民之心。当然，《冰溪行为徐烈妇作》系为烈妇所作序和诗，也反映他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具有保守的一面。

光绪八年（1882年）为乡试之年。在封建社会中，虽然举人与贡生都为科举正途，但是举人的社会地位高于贡生。陈炽自同治十二年（1873年）即成为拔贡生，至此已经九年，自然不想错过中举机会，恰好他在家休假，就参加了壬午科江西省乡试，中第46名举人。第二年即光绪九年（1883年）陈炽销假回到京师任职。^①自此到甲午战前这十年时间内，是陈炽目光投诸现实问题以及维新思想的形成时期。光绪十二年（1886年），陈炽参加军机章京考试，夺得八人中首名。军机章京处理军机处日常事务，如处理文书、记注档册、撰拟文稿等，陈炽因长期担任军机章京，故对朝廷的典章奏疏较为熟悉。后又外出游历沿海及

^① 参见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档案履历全编》，第6册，20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港澳地区，翻阅过大量西书译本，咨询过游历归国人员。所有这些经历使陈炽对封建政权内部的吏治、财政危机等问题具有深入的认识，因此他慷慨论谈时务。光绪十年（1884年），他曾上奏清廷，建议清廷赐刘永福以稍重之衔，使其在边外练勇屯田，以为国家御侮；由户部代奏将大凌河牧厂移往蒙古草地片，建议将大凌河西岸牧厂移往蒙古草地，开展“屯田，以为东三省及朝鲜援应”；由户部代奏整顿西藏事务折，建议清政府在西藏通商、惠工、开矿、劝学等。光绪十一年（1885年），由户部代奏敬陈东三省情形管见事，主要谈论东三省练兵之事。他还多次上书李鸿章、翁同龢、陈宝箴、刘坤一等清廷高官大员，就朝鲜问题、黄河改道、筹饷、教案、修建铁路等问题发表意见。例如，光绪十一年（1885年）陈炽致函李鸿章，分析朝鲜内乱发生原因，并提出处理朝鲜问题的看法。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河从郑州决口后，陈炽向翁同龢呈送议河说帖；次年上翁同龢务农恤商劝工八条；光绪十七年（1891年）上书翁同龢谈论筹饷的问题。光绪十七年（1891年），陈炽在给陈宝箴的书信中表示，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建成后，必然会对中国边防构成威胁，而中国东三省“千里平原，隘口歧出，实非铁路不能守”，认为应早建铁路，“俾得早竟全功，或可豫弭隐患耳”^①。同年秋，陈炽致函刘坤一，询问芜湖等地教案后事。

光绪十六年（1890年），陈炽担任户部浙江司主事。次年任职户部四川司员外郎，兼值军机章京汉头班。光绪十七年（1891年）冬，陈炽因父亲去世，请假回籍。在为其父亲营葬守孝期间，陈炽曾致书陈三立请为其父撰墓志铭，致函李盛铎让其推荐会看风水之人。同时，他为宁州城内白溪陈氏俊卿祠堂撰记、瑞金合邑宾兴谱写序，为父亲生前好友陈为理撰写墓志铭，筹建瑞林禾塘陈氏宗祠等。光绪十八年（1892年）春，他为好友郑观应参订《盛世危言》，次年又为其写序，初步表达了自己的维新变法思想。虽然仅仅是一篇序言，但这却是陈炽由封建知识分子向早期维新派转化的里程碑，在陈炽思想发展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受郑观应《盛世危言》影响，光绪十九年至二十年（1893—1894年）陈炽著成《庸书》百篇，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剖析，尤其是倡议实行君民共主政体，采用议院制，

^① 陈炽：《上陈宝箴书》，见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六辑，184～18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等思想，标志着其维新思想体系初步形成。

甲午战争爆发后，陈炽对时事非常关注，积极上书献策。他曾上书刘坤一，陈言军国大计；致函翁同龢评论战局，旁征博引，翁氏阅后赞其为“通才”。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翁同龢将陈炽《庸书》进呈光绪皇帝御览。是年四月，陈炽守孝期满返京复官，仍以员外郎任职户部，同时兼值军机章京上额外行走。

甲午战败后，为救亡图存，全国各地掀起变法的热潮。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大声呼喊“变亦变，不变亦变”。康有为等会试举人联合上书，要求废约、迁都、变法。陈炽痛感时艰，遂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上清帝万言书，反思战败原因，请求清政府“一意振作，变法自强，以巩皇图而湔国耻”，并且提出下诏求言、阜财裕国、分途育才、改制防边、教民习战、筑路通商、变法宜民等善后措施。当清廷筹措对日赔款时，陈炽与李盛铎积极参与协商，并多次与翁同龢通信提出自己的建议。

在这一时期内，陈炽的维新思想由激进到退缩，行动上有一个从积极参与到游离的过程。《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陈炽曾送给翁同龢善后封事八条，得到翁氏称赞，认为皆善后当办者。在翁同龢的推荐下，陈炽曾参与纂修《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钦定平定苗匪纪略》《钦定平定陕甘回匪方略》，因纂修有功，升户部郎中，外任以道员用。当时，维新运动如火如荼，翁同龢受形势影响倾向于变法，而康有为也想通过他推动变法事业。陈炽作为翁同龢的亲信僚属，在康有为与翁同龢之间，穿针引线，积极为变法奔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翁同龢与康有为商谈改革大计，陈炽为之草拟十二条新政意旨，准备次第实行。后因恭亲王奕訢反对没有实现。同时，他为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修订建议改革的《新政策》。当康有为屡函促责翁同龢抓紧推动变法时，陈炽曾代翁氏到康有为处谢答，并建议康有为“办事当以办报为先”，捐助其办报事业。然后陈炽与康有为等人筹建强学会，往返于京沪之间，为学会购置图书仪器奔忙。京师强学会成立后，陈炽被推选为会长。强学会得到了许多督抚大吏的支持和帮助，李鸿章也欲捐三千金入会，为陈炽等人拒绝。是年底，因御史杨崇伊弹劾强学会“植党营私”，清廷下旨意令封禁强学会。后在翁同龢、御史胡孚辰的建议下，清廷允准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由孙家鼐管理，陈炽仍留任事。

此后，陈炽用很大精力研究经济问题。他认为改变中国贫弱之原的

途径之一是发展经济，先后由户部代为专奏《茶务条陈》《铸银条陈》等，就有关国家利权问题陈述己见。前者专论在对外贸易中占很大比重的“茶务”，分析昔盛今衰的严重形势，提出振兴茶务的参用机器、准设小轮、创立公栈、暂减捐厘等四条办法；后者根据世界货币发展趋势，分析中国不铸金钱之弊，建议中国应该自铸金币，同时通用外国金币，并提出引进西方机器、自铸钱币、革新圜法的具体办法，强调这是整顿财政、发展经济、富强国家的根本举措。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陈炽撰成《续富国策》60篇，分农书、矿书、工书、商书四卷，系统地提出了当时中国发展经济的方案。另外，他曾从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中了解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时称《富国策》）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于是与友人重译《富国策》，在《时务报》连载。不过，陈炽所译的《富国策》，不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是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法思德（Henry Fawcett）的《政治经济学手册》（*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同时，陈炽继续关注世界大势，在《时务报》《知新报》上发表《中日之战六国皆失算论》《美德宜力保大局说》《俄人国势酷类强秦论》等系列探讨甲午战争后国际关系的论文。

为推动维新运动的发展，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立《时务报》。陈炽积极参与此事，除为之撰稿外，亦行在北京代收捐款、发行等事。他曾四次与《时务报》总经理汪康年通信，谈论《时务报》篇首论说、《重译富国策》刊载及京师吏治等事。后因《时务报》内部矛盾重重，陈炽与李盛铎在上海劝说梁启超在《时务报》之外，再开日报《公论报》。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推广学校折》，主张京师以及各府州县皆设立学堂，陈炽也积极呼吁清廷尽快开办，并为孙家鼐草拟大学堂章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京师大学堂筹备工作已臻完毕，孙家鼐欲聘请康有为任总教习，陈炽为总办。康有为辞之，陈炽等曾劝其就任。

陈炽在维新运动中异常活跃，深受各派人士重视。不过，陈炽的行动一开始就带着小心翼翼的烙印。《万国公报》（强学会初期刊物）创刊之初，因宣传新的思想观点引起顽固派徐桐、褚成博的反对，他们要弹劾康有为。陈炽得知风声后，不是与康有为商量积极应付的对策，而是规劝其出京暂避风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底，强学会遭查封后，

陈炽与文廷式、李盛铎一并被御史杨崇伊弹劾，文廷式因此被革职。陈炽虽没有受到处理，但也受惊非小，开始变得谨小慎微，唯恐触犯清律。他曾忧心忡忡地告诉汪康年：“中国君权太重，都中一事不办，外间遂欲办一事而不能，自上下无一不揣摩迎合也。”同时，对于《时务报》刊发的关于民权学说的文章，陈炽也感到有些惴惴不安，于是两次写信给汪康年，表明他此时的态度：“从强学会封禁，《立言》恐招忌恨，非本报所译。弟引此以证议院民权之不可再说耳。”“公度事可疑可诧，渠至都即讲民权，弟已规之，大约不能从耳。”^① 鉴于政治形势严峻，陈炽自己是不敢奢谈议院了，并且规劝别人也少谈为佳。

此时，他与翁同龢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翁氏在日记中载：“陈次亮以折示我，全是风话，内有涉余名者一句，以墨笔捺出，还之，不如此不能断此妖也。”^② 从共同呼吁变法至两人关系开始出现矛盾，说明了维新变法进程的复杂性。不久翁同龢被黜，陈炽更是失去了靠山和希望，变法的热情再度受挫。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他常与江标、赵炳麟等一批具有维新思想的中小官僚相聚，议论时政，注视着变法进程。他曾将所著《庸书》上之当道，又告康有为皇上实英明通达，过于群臣。戊戌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六君子喋血菜市口，陈炽虽然没有受到追究，不过也遭到很大打击，往往酒前灯下，高歌痛苦，若痴若狂，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病逝于北京城。

二

作为中国近代早期维新思想家，陈炽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力陈中国引进西法以变革的重要性

陈炽认为当时中国面临“千古非常之变”，世界已形成了“地球一统，万国会同”的格局，变成了“一维新之宇宙”，世界各国之间已不再是彼此隔绝的状态，中国如果仍据守旧道，不思变法，就会落到像越南、琉球等国因不变法而“亡不旋踵”的结局；如果像日本那样变法，既能存在于当世，又能使国家“强且富”；如果像暹罗、朝鲜那样当断

①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2075～207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②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六册，30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

不断,“欲变而未变者也,其势岌岌然,如不终日”^①。他既反对顽固守旧者“深闭固拒,尊己而抑人,事变既来,茫昧昏蒙,束手无措”,又反对激进维新者“不深察中国之人情与国家创制显庸之本意,又张皇震讶,欲一切舍己而从之”,主张“法之宜守者,慎守之,实课以守法之效,毋庸见异而迁也;法之当变者,力变之,实责以变法之功,毋俟后时而悔也”^②。所以陈炽认为“西法之本出乎中,则无俟概行拒绝。然而受之则富,否则贫,得之则强,否则弱”,“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空谈无补,实丧易危”^③。他强烈要求学习西法以变法自强。为了减少阻力,他多次采用西学中源的办法,主张中国从多方面学习西方国家,而不是仅仅学习船坚炮利和声光化电的自然科学知识。同时,陈炽批评洋务派的孜孜于“利炮坚台、鱼雷铁舰之属”是“遗其大体而袭其皮毛”,“弃其菁英而取其糟粕”^④。显然,陈炽希望中国学习“大体”“菁英”,要进行一场比洋务运动更加深刻的变革,即应该是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改革。

(二) 政治改革思想

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陈炽对当时的吏治情况及政治制度的运行较为了解,因此对封建吏治的揭露和君主专制制度的批评即更加深刻。他指出当时清政府的官僚体制已经存在各种弊端。“法日改而日精,网日张而日密,文日积而日繁,内外官吏营私骛弊之方,亦日趋而日巧”。“文法拘牵,是非淆杂”^⑤,“部饭则彼此分肥,工程则相将染指”^⑥。“偶有尽心民事者,则上官倚之,同僚笑之,众庶疑之,不入考成,不登荐牍,群掣其肘,必溃于成而后已。不肖者,专揣缺分之肥瘠,以图饱私囊;其贤者,亦第求案牍之清厘,以规避处分。于设官为民之本意,上下泰然,久已忘之,而且习之矣”^⑦。“天下万国,最贪者,中国之官”^⑧。另外,他还指出捐例的存在败坏吏治,大蠹民生;

① 陈炽:《庸书·自强》,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② 《庸书·名实》。

③ 《庸书·自强》。

④ 《庸书·自叙》。

⑤ 《庸书·名实》。

⑥ 《庸书·养廉》。

⑦ 《庸书·教养》。

⑧ 陈炽:《上清帝万言书》,见孙祥吉:《晚清史探微》,142页,成都,巴蜀书社,2001。

胥吏盘踞要津，索贿营私，殃民害政；京官与外官之间勾结、积案问题严重、考核官吏时徇私枉法等皆是吏治中存在的问题。因此，他提出必须整顿吏治，严格考绩。

陈炽继承中国古代“立君为民”的思想，“天生民而立之君，君者群也，所以为民也”，但他认为三代以前“君”是为民之君，秦以后君是害民之君，特别是君主专断于上，百官横行于下，“民之视官如帝天，官之视民如土芥”，“吏役之爪牙四布，以养民则不足，以虐民则有余”，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封建君主专制的“贵私”、“贵虚”、愚民而致。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陈炽认为要破除这种言路堵塞、上下隔绝的痼弊，一个很好的办法是仿照西方，广开报馆，开通言路。当然，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改革。他比较了当时世界上存在的君主、民主与君民共主这三种政体形式，认为前两种均存在着弊端，唯有君民共主能够“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能够通上下之情，而且可以敌外患，“即敌国外患纷至沓来，力竭势孤，莫能支柱，而人心不死，国步难移。积土成山，积流成海，能胜而不能败，能败而不能亡”^①。同时，他又设计了君民共主体制下的上下议院的组织原则和议员选举的具体办法。甲午战争后，陈炽在《上清帝万言书》中明确指出国家欲自强，必须变法，以练民兵、开议院为成功。陈炽批判选官制度弊端重重，提议去除捐例，严肃吏治，尤其是建议中国设议院、采取君民共主的政体，是其政治上最有特色和时代先进性的思想，也是其思想体系中“最闪光的部分”^②，是陈炽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

虽然陈炽在政治领域提出一些设想和建议，但也出现过保守和动摇。除了政治策略考虑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陈炽在思想观念上仍然是封建三纲五常的维护者。他认为“西人忠信明决，实为立国之原，而三纲不明，五伦攸教，则他日乱机之所伏，即衰象之所由成也。夫君为臣纲，古有明训。西人倡自主之说，置君如奕棋，其贤者尚守前规，不肖者人思自取，若巴西诸国，彼此相攻，大乱方滋，隐忧未艾。此无君臣之伦者，不足以致太平也”^③。同时，他还指出：无父子兄弟之论，不足以存种族；无夫妇之论者，不足以广似续。因此，陈炽认为学习西方

① 《庸书·议院》。

② 孔祥吉：《晚清政治改革家的困境——陈炽〈上清帝万言书〉的发现及其意义》，载《广东社会科学》，2000（2）。

③ 《庸书·审机》。